

毛泽东写给雷经天的一封信

□ 孟昭庚

1937年10月5日晚，随着两声枪响，陕北公学16岁的女学员刘茜倒在了血泊中。行凶者抗大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竟残忍地枪杀了他所追求的恋爱对象，使自己由革命功臣沦为杀人犯。这就是当时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国统区的“黄克功案件”。黄克功被捕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据毛泽东当时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回忆，他就曾收过黄克功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给毛泽东的信。黄克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承认自己的罪行，请毛主席定夺；雷经天在给毛泽东的信上虽未直言他不主张杀黄克功，但在字里行间确实流露出很惋惜、要给黄克功一条生路的想法。

陕北公审黄克功

案发6天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0月11日在被害人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对黄克功进行公开审判。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亲临现场。出席公审大会的还有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副主任胡耀邦、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处长黄左超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担任刑庭审判长，高等法院检察官徐世奎是公诉人，袁平、任扶中是书记员，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王惠子、周一明、沈新发等四位同志为陪审员。

在陪审员、审判员、起诉人、公诉人、证人、辩护人进入会场后，雷经天宣布开庭。起诉人和公诉人先向大会陈述了黄克功案件的全部细节，指出：黄克功对刘茜实施求婚未遂以致枪杀革命青年，在黄克功的主观上属强迫求婚，自私自利无以复加。黄克功曾是共产党员，又是抗大干部，不顾革命利益，危害边区法令，损害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实质上无异于帮助日本汉奸破坏革命，应严肃革命的纪律，处以死刑，特提向法院公判。

雷经天让黄克功发表个人陈述时，黄克功用从容流畅的语言，毫不隐讳地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简历，坦白交代了他的犯罪经过，并且作了扼要的检讨。他没有为自己辩解，他提出的惟一的“理由”，只是认为“刘茜破坏婚约是侮辱革命军人”。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整个会场却能听得清清楚楚。当审判长特意问他“都在哪些战斗中受过伤，挂过彩”时，他敞开了衬衣，指着从臂膀到腿部一块接一块的伤疤，历数了许多战斗过的地名。当审判长问他还有什么请求时，他说：如果死刑必须执行，我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人的法场上。如果允许，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如果不合刑律那

就算了。

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罪犯，是曾为革命多次负伤流血而作出很大贡献的功臣，不少人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尤其是一些身经百战的红军老干部甚至痛哭流涕，场面极其悲壮，一时令观者不忍目睹。

短暂休庭后，审判长雷经天严肃宣布对黄克功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判决书直陈黄克功的杀人动机：“刘茜今年才十六岁，根据特区的婚姻法令，未达结婚年龄；黄克功是革命干部，要求与未达婚龄的幼女刘茜结婚，已属违法，更因逼婚未遂以致实行枪杀泄愤，这完全是兽性不如的行为，罪无可道。”

对判决的结果，黄克功没有表示任何反抗、抵触、激动或消沉的情绪。他向凤凰山麓毛泽东住的窑洞方向望了一眼，便在行刑队监押下，穿过坐在东北侧的人群，向刑场走去。

现场宣读毛泽东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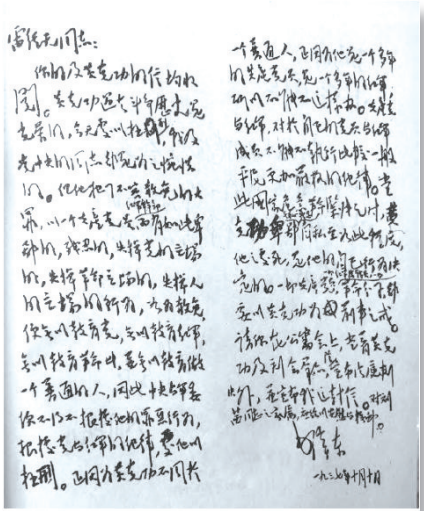
就在黄克功走到会场边时，只见一匹快马向会场飞奔而来。毛泽东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翻身下马，径直向雷经天走去。雷经天起身接过那位工作人员递给他的一个信封。主席台上立即传出声音：“信，毛主席的信！”那声音很小、很快，但“毛主席的信”像风一般传遍会场。黄克功在会场边也听到了，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停住了脚步——他比任何人都关心这封信。

这封信是毛泽东于10月10日夜写好给雷经天的，以答复雷经天和黄克功给他的信。本来想让参加会议的张闻天带交雷经天的，可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休息时忘了交代秘书，所以才在午后派人飞马送到会场。

因为毛泽东的亲笔信上建议要当着黄克功本人的面向大会宣读，审判长雷经天与张闻天商议后，又命令把黄克功带回来，让其重新站在被告人位置上。当黄克功知道毛泽东有信要向他宣读时，流露出希望和感激之情。因雷经天是广西南宁人，讲话地方口音浓重，担心与会者听不懂，便将信交给也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讲话声音清脆的莫文骅，请他代为宣读：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最极刑。正



毛泽东就黄克功案写给雷经天的信

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处，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随着莫文骅的声音停止，大家再将目光转向黄克功时，他才如梦一般醒来，高高扬起头，看了看蓝天、白云。

“黄克功案”处理后，毛泽东还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 and 情感，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此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是万万要不得的。

（摘自2015年第8期《党史纵横》，原标题为《黄克功案件始末》）



何叔衡：人民政权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

□ 黄慕泽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于江西瑞金成立，何叔衡任主席。而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于1934年2月正式成立。

如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法院旧址院内，立着一个造型生动的人物铜像。双方村民握手言和的形象背后，是何叔衡化解两村“争水”的故事。

深入田间地头调解纠纷

瑞金四区白露乡毛姓一村少数土劣把持水源，利用封建迷信，煽动落后群众阻碍他村放水，甚至发生械斗。合龙乡群众因春耕，迫切需要引水灌溉，于是向中央政府提出控告。

中央政府派人前往该乡调查，并于1932年3月8日协同白露、合龙两乡群众讨论，打

破迷信恶俗，决定继续放水。但至3月底，毛姓少数人又违约将水坝捣毁，故意妨碍水利，违犯土地法令。白露、合龙两乡向临时最高法院控告。

同年4月，时任中央临时最高法院主席何叔衡亲自到瑞金县，会同县裁判部组织巡回法庭，召集区负责人及两村开会，秉持着司法为民、调解优先的裁判理念，争取到毛姓大多数群众的支持，有效化解了白露、合龙两乡的水利纠纷，使案件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成为苏区审判工作的典范。

从入党那天起，便把生命完全交给了党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史陈列馆里，身着红军军装的讲解员向记者讲述了这位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何叔衡的生平事迹。

何叔衡（1876—1935），湖南宁乡人，字玉衡，号琥璣。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成立了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作为年龄最长的会员，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何叔衡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是不怕死的。我们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党了。”1931年11月，怀揣着忠诚信仰，何叔衡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中心——江西瑞金，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在中华苏维埃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何叔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即部长）。1932年2月19日，中央政府决定组织临时最高法院，委任何叔衡为临时最高法院主审（主席）。

“叔翁办事，可当大局”，这是毛泽东对何叔衡的评价。从清末秀才到反封建志士，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何叔衡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与中央苏区的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并称为“五老”，是我党司法战线的先驱和卓越领导人。

审理案件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何叔衡审

判案件时，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注重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他在审核过程中非常慎重，对每一个案件都仔细审查、反复推敲。尤其是对省、县、区已判死刑的案件，他严格掌握量刑尺度，凡是材料不充分、量刑有偏颇，就不予批准，纠正了大批的冤假错案。“朱多伸案”就是其中一例。

“被告人朱多伸，瑞金县王田乡人，判决：朱多伸处以枪毙。”1932年5月，何叔衡接到了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送来的第20号判决书。

由于下乡检查工作时曾多次与朱多伸接触，根据自己对朱多伸的了解，何叔衡觉得这个案子后面必有隐情。于是，何叔衡立即背起行囊赶赴王田乡进行调查核实，发现朱多伸尽管有一些罪过，但主要是他多次举报的乡干部企图借此报复他。因此，何叔衡在判决书上作出批示：“关于朱多伸判处死刑一案不能批准。朱多伸由枪毙改为监禁二年。根据口供和判决书所列举的事实，不过是贪污怀私及冒称宁、石、瑞三县巡视员等等，是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且朱多伸曾组织游击队，参加过革命，又年已七十二岁，因此减死刑为监禁。”

“何叔衡的这个批示，短短几十个字，就把法律理由、道德底线和人情世故，把情、

理、法都融在了案子里，是我们司法审判的典范。”瑞金市人民法院四级调研员钟冬庆谈及此案时如是说。

在坚持依法审判，重程序、重证据，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同时，何叔衡又是一个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黑脸包公”。对于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他在定罪量刑上从不心慈手软。例如，在1932年5月为朱多伸减刑的同一天，何叔衡还同时审理了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上报的关于钟同煥和罗宏接两个反革命案件。钟、罗二犯均残杀过革命同志，罗宏接还有收买子弹接济团匪，到苏区瑞林寨烧杀抢劫等犯罪行为，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判处二犯死刑，何叔衡经过核实，立即批示将二犯执行枪决。

在展厅里，记者看到，何叔衡这一时期的批示、指示，涉及审判程序、法律文书规范、适用法律的解释等审判工作的各个方面，字里行间都洋溢着革命的热忱，体现出法律的严谨。

正是何叔衡这一细致入微、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推动了中央苏区审判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为我党早期的法制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人民司法的建设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摘自2021年7月1日《人民法院报》）

这位得救的孩子就是后来朝鲜军中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罗盛教为救不慎落水的朝鲜儿童崔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一年，罗盛教刚满21岁。那个在数九寒天里向着冰河义无反顾纵身跃下的年轻身影从未走远，直到今天依然震撼我们的心灵。

罗盛教，1931年出生在湖南省新化县松山乡桐梓村马龙塘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寒，11岁才上小学。他以顽强刻苦的精神，晚上挑灯苦学到深夜，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省立第九师范。

新中国成立后，罗盛教报名参军，被送到湘西军政干校学习。1950年罗盛教被调到某部文书训练班学习，之后又被分配到四十七军一四一师直属侦察连任文书，参加湘西剿匪斗争。

1951年，罗盛教响应党的号召，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并随部队奔赴朝鲜。

当罗盛教踏上朝鲜的国土，看到遍地烧焦的房梁瓦砾时，捍卫和平的信念更加坚定。他暗暗发誓：不消灭美帝强盗，我决不回国！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被侵略者的子弹打中，请战友们千万不要在我这里停留！一定要继续前进，奋勇前进，矢志为千万朝鲜人民和牺牲的同志报仇！”

1952年1月2日，新年伊始，正是朝鲜半岛冰天雪地的时节。罗盛教一大早便来到了附近的冰河边，准备练习投弹。就在这时，河面上突然传来几位朝鲜少年急促的哭喊声。罗盛教听不懂朝鲜语，但当他看到朝鲜少年的手势和破裂的冰面时，立即明白了一切。他一边奔向冰窟，一边脱下棉衣，纵身跳进了冰冷彻骨的河水中。

冒着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罗盛教沉着冷静，很快便摸索到了落水的那位朝鲜少年，并成功将他托出了水面。可是，由于冰窟边缘的冰面太薄，承受不了落水少年的体重，两人马上又跌落到了水中。

一次、两次、三次……少年三次被托出水面，但三次都没能上岸。这时，罗盛教的体力已消耗殆尽，四肢变得麻木而僵硬，但他仍顽强地再一次沉到水底，再一次找到孩子，并再一次将他顶出了水面……

这位得救的孩子就是后来朝鲜军中的

1985年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同意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1985年9月10日，全国教师迎来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从此，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成为国家表彰教师功绩、提倡社会尊师重教的节日。

1985年9月10日，许多教师度过了难忘的第一个教师节。在河南信阳师范学院的门口，下班的老师个个面带喜气。他们或抱或拎，拿的都是学校发的教师节纪念品——30元一床的腈纶毯子。“刚参加工作就过节，还是第一个教师节，感觉太幸福了！”周虹这样回忆说，那时候她每月工

资45元，这个纪念品绝对算大件了。抗日将领赵登高的女儿赵学芬，当时做小学教师已有32年了。她激动地说，在第一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我深深感到，做一个小学教师肩上担子是很重的。教学生不仅是传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他们爱国家、爱人民，使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人才。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要继承先辈遗志，做好基础教育工作。

教师节的设立成为我国教师地位不断提升、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摘自2020年9月10日《团结报》，原标题为《教师节设立背后的故事》）

理、法都融在了案子里，是我们司法审判的典范。”瑞金市人民法院四级调研员钟冬庆谈及此案时如是说。

在坚持依法审判，重程序、重证据，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同时，何叔衡又是一个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黑脸包公”。对于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他在定罪量刑上从不心慈手软。例如，在1932年5月为朱多伸减刑的同一天，何叔衡还同时审理了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上报的关于钟同煥和罗宏接两个反革命案件。钟、罗二犯均残杀过革命同志，罗宏接还有收买子弹接济团匪，到苏区瑞林寨烧杀抢劫等犯罪行为，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判处二犯死刑，何叔衡经过核实，立即批示将二犯执行枪决。

在展厅里，记者看到，何叔衡这一时期的批示、指示，涉及审判程序、法律文书规范、适用法律的解释等审判工作的各个方面，字里行间都洋溢着革命的热忱，体现出法律的严谨。

正是何叔衡这一细致入微、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推动了中央苏区审判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为我党早期的法制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人民司法的建设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摘自2021年7月1日《人民法院报》）

资45元，这个纪念品绝对算大件了。抗日将领赵登高的女儿赵学芬，当时做小学教师已有32年了。她激动地说，在第一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我深深感到，做一个小学教师肩上担子是很重的。教学生不仅是传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他们爱国家、爱人民，使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人才。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要继承先辈遗志，做好基础教育工作。

教师节的设立成为我国教师地位不断提升、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摘自2020年9月10日《团结报》，原标题为《教师节设立背后的故事》）

这位得救的孩子就是后来朝鲜军中的



罗盛教：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 谢樱

高级指挥官崔莹。然而罗盛教却再也没能爬上来。

找到罗盛教烈士的遗体后，朝鲜石田里人民异常悲痛。他们按照朝鲜当地最隆重的葬礼，将他安葬在苍翠秀丽的佛体洞山上。石田里人民委员会在罗盛教牺牲的地方竖起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生长在朝鲜土地上的人民，都应该永远记着我们的友人罗盛教同志，学习他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

（摘自2019年7月2日《光明日报》）

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

□ 张文

1985年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同意关于建立教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的9月10日为教师节。

1985年9月10日，全国教师迎来属于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从此，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成为国家表彰教师功绩、提倡社会尊师重教的节日。

1985年9月10日，许多教师度过了难忘的第一个教师节。在河南信阳师范学院的门口，下班的老师个个面带喜气。他们或抱或拎，拿的都是学校发的教师节纪念品——30元一床的腈纶毯子。“刚参加工作就过节，还是第一个教师节，感觉太幸福了！”周虹这样回忆说，那时候她每月工

资45元，这个纪念品绝对算大件了。抗日将领赵登高的女儿赵学芬，当时做小学教师已有32年了。她激动地说，在第一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我深深感到，做一个小学教师肩上担子是很重的。教学生不仅是传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他们爱国家、爱人民，使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人才。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要继承先辈遗志，做好基础教育工作。

教师节的设立成为我国教师地位不断提升、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摘自2020年9月10日《团结报》，原标题为《教师节设立背后的故事》）

理、法都融在了案子里，是我们司法审判的典范。”瑞金市人民法院四级调研员钟冬庆谈及此案时如是说。

在坚持依法审判，重程序、重证据，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同时，何叔衡又是一个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绝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黑脸包公”。对于证据确凿、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他在定罪量刑上从不心慈手软。例如，在1932年5月为朱多伸减刑的同一天，何叔衡还同时审理了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上报的关于钟同煥和罗宏接两个反革命案件。钟、罗二犯均残杀过革命同志，罗宏接还有收买子弹接济团匪，到苏区瑞林寨烧杀抢劫等犯罪行为，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判处二犯死刑，何叔衡经过核实，立即批示将二犯执行枪决。

在展厅里，记者看到，何叔衡这一时期的批示、指示，涉及审判程序、法律文书规范、适用法律的解释等审判工作的各个方面，字里行间都洋溢着革命的热忱，体现出法律的严谨。

正是何叔衡这一细致入微、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推动了中央苏区审判工作的规范化建设，为我党早期的法制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人民司法的建设和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摘自2021年7月1日《人民法院报》）

资45元，这个纪念品绝对算大件了。抗日将领赵登高的女儿赵学芬，当时做小学教师已有32年了。她激动地说，在第一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我深深感到，做一个小学教师肩上担子是很重的。教学生不仅是传授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他们爱国家、爱人民，使他们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人才。我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要继承先辈遗志，做好基础教育工作。

教师节的设立成为我国教师地位不断提升、教育事业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

（摘自2020年9月10日《团结报》，原标题为《教师节设立背后的故事》）

这位得救的孩子就是后来朝鲜军中的

